



【同题问答】

齐鲁晚报：您正在看的书有哪些？

钱理群：我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直在读中国乡村建设先驱梁漱溟、陶行知、晏阳初、卢作孚的全集。我前年说要在“教育之外谈教育”，但没有完全离开教育，我现在更关注社会教育。我去年做了两件事，一是和北大一些师生编了一本《平民教育人文读本》，这本书主要是给打工者读的；另外我编了一套《志愿者文化丛书》，这是给志愿者提供的精神资源。

齐鲁晚报：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是哪一本？

钱理群：肯定是鲁迅的书了。

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

尽管早在两年前就宣布要“告别教育”，但对于著名学者钱理群而言，教育依旧是他的退休生活中绕不开的话题。只是面对学校教育中越发坚固的既得利益链条，75岁的钱理群自知难有突破，他转而关注平民教育和志愿者教育，在教育之外言教育。

钱理群以振聋发聩的批评闻名，但他却时常提醒自己要与现实保持距离，勿忘作为知识分子的本分。对于种种关于鲁迅作品逐渐退出教材的争议，这位鲁迅研究专家很少表现出担忧，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——要相信鲁迅。

近日，在新书《我的家庭回忆录》出版之际，钱理群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专访。

影响“醒着的青年” 钱理群： 教育之外言教育

□本报记者 吉祥

谈教育：既得利益链条不打破，教育难有根本变化

齐鲁晚报：是什么促使您的关注点从学校教育转变到平民教育？

钱理群：这主要是基于我对现在的中小学教育的判断，中小学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链条，且很难打破，而这个既得利益链条只要不打破，中小学教育要有根本性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我关心打工者教育和志愿者教育，是因为打工者是弱势群体，而弱势群体的觉醒会影响中国的未来。作为知识分子，我不能做别的事情，但至少可以通过编人文教材帮他们觉醒，认

识到自己的权利。关注志愿者是因为我看好年轻人的力量，虽然我不能直接为弱势群体服务，但我能做的是影响青年。我经常说“想大问题，做小事情”，我做的都是小事情，但我所思考和要解决的是大问题。

齐鲁晚报：您曾说要“告别教育”，但您一直通过演讲等方式影响一线老师。这些年与一线老师的互动，您认为哪些是您比较欣慰的，哪些问题是您认为推动起来比较困难的？

钱理群：我寄希望于一线教师，实际上我也认为一线的确有很多好

的。我在教育界是举理想主义旗帜的人，所以有很多老师找我，我的书可以帮我发现一大批这样的教师。我相信中国还是有一批有理想、有教育良知的教师，只不过这些老师现在比较孤独，我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概括：比例很小，绝对量并不小。我寄希望于这个群体的作用，影响一个是一个。用鲁迅的话说，大部分青年是睡着的，玩着的，醒着的是少数，但实际上对历史起作用的是“醒着的青年”，只要你培养了一批醒着的青年就不得了。

谈家庭：家史是国史的缩影

齐鲁晚报：就《我的家庭回忆录》问您两个问题，您的家庭对您日后的成长特别是学术研究的影响大吗？

钱理群：影响非常大。我这本回忆录和市场常见的回忆录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，我不是纯感情的回忆，我写作的时候带着双重身份：我既是一个家庭成员，也是学者，把这段家庭历史当成我的研究对象。我的家庭非常典型，比如说我的家庭成员里有国民党，有共产党，还有普通市民，我的外祖父又是晚清维新派的代表人物。我的家庭成员本身就是一部知识分子命运史。所以有人评价说，这部家史实际上是国史。

至于家庭对我的影响，比如我对农村问题的关注，开始并不是受父亲影响，但我后来发现是继承了父亲，这让我非常高兴。实际上我的家庭对我的影响特别大，影响了我的价值判断。我的专业研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国民党、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。我认为第一要理解之同

情，无论是我的共产党的哥哥，还是国民党的父亲，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，我的父亲从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认同了国民党，而我的哥哥当时要追求民主自由而认同共产党。所以我认为国共两党都有最优秀的知识分子，因此我对两党的态度一是理解之同情，另外我认为他们都有要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。

我的立场不容易被现在的学者和普通人接受，因为现在人思维太简单，要么站在国民党一边非常美化民国，要么站在共产党一边把国民党恨之入骨，我对两者更能理解之同情。而且坦白来说，从我感情的角度，当然也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系，我是更倾向于加入共产党的哥哥，一个原因是父亲去了台湾和我们不在一起，另外就是我认为哥哥当时做出这个选择冒着很大的风险，几乎是意味着背叛父亲的。

齐鲁晚报：您在写作的时候会不

会假设另外一种可能，比如您或者当时的某个家庭成员换一种选择会怎样？

钱理群：当然也有人问：假如钱理群随着父亲去了台湾会怎样？还有人把我跟李欧梵作比较：如果钱理群到台湾去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李欧梵？那是可能的。还有一个人问台湾的学者：如果钱理群去台湾了，还有今天的钱理群吗？

也有很多人认为我大哥从美国回来可惜了，他是小爱因斯坦的学生，他们觉得如果不回来，他的地位和今天就不一样了。但我大哥不后悔，他是学水利的，中国有黄河、长江，从专业角度说，黄河、长江在世界上有几个？现在好些人有偏见，好像回国就是一片黑暗，其实并不是这回事，你去问老一辈科学家，他们绝不会后悔回国，即便经过“文革”的磨难。他们想得很简单，就是爱国，就一定在中国的国土上，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能理解他们。

谈知识分子：知识分子要与现实保持适当距离

齐鲁晚报：这几年，一些退休学者如资中筠、茅于軾表现得似乎比年轻学者更活跃，更关注公共话题，一些批评也更尖锐，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？

钱理群：这一方面和体制有关，另外就是这些人已经功成名就，没有更大的追求。我也时刻告诫自己，要和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不要过于介入现实。我最近要出一本书叫《知识分子的本分》。知识分子的本分是什么？其实现在我们误解了，因为很多知识分子远离现实、不关心现实，所以大家非常强调知识分子要介入现实，恨不得让知识分子成为战士。我觉得知识分子介

入现实是对的，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体现，但如果只是一味地介入现实，而且介入过具体的现实政治，就会丢掉知识分子的本分，因为知识分子的本分是思考思想问题、精神问题。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只关心现实问题，而忽略了对于一些根本问题的思考，那么这个知识分子至少是不完善的，有缺陷的。

现在中国最缺少的是大哲学家、大思想家，回答、思考一些根本性的价值观的问题、人性的问题、精神的问题，并且提出新的想法。

齐鲁晚报：您所说的大师的标准是什么？

钱理群：大师是要有原创性、独创性的，但现在我们国家一个也没有，而且还没有这种自觉。我去年给青年做过一个演讲，我对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，我说：“在座的，你们的年龄是20岁、30岁、40岁，你们和我的年龄差距是30岁到50岁之间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未来30年到50年，你们会面临什么问题？中国和世界会遇到什么问题？”这是年轻人应该回答的问题。年轻人现在都在逃避现实，能够关注现实就已经了不起了，但在我看来，仅仅关注现实还不够，还要从现实中跳出来，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。

谈鲁迅：要对鲁迅有信心

齐鲁晚报：您长期研究鲁迅，为什么现在鲁迅不仅从教材里退出了，在社会生活层面似乎也在逐渐退出？

钱理群：我觉得我们要对鲁迅有信心。我曾经有一个判断，我现在仍然坚信不疑：一个人只要具备两个条件，一是有一定的文化条件，因为鲁迅的很多东西不是很好懂；第二个是这个人是在思考问题，那他迟早会接触鲁迅。因为鲁迅对问题的思考，并不仅仅停留在某个具体问题上，他比较超越。鲁迅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，他的作品是谈人性深度的问题。我也发现很多年轻人，

在中学时不喜欢鲁迅，但到了一定年龄，有思想、有追求的时候就开始读鲁迅。

我曾经说，中学讲鲁迅的目的通俗点说是为了“认门牌号码”，让学生知道个大概，至于内容，似懂非懂就够了，根本不可能要求学生深刻理解鲁迅。可是，如果在中学都取消鲁迅的话就麻烦了，以后就不可能找他了。我一直讲不能低估中学生的理解能力，我的书《钱理群中学讲鲁迅》附了很多学生的作业，水平相当高啊，很多我们的研究者未必做得出来，不要低估年轻人对鲁迅的理解。

我刚写了一篇文章，有一批70后鲁迅研究者写了一本书要我写序，他们当中就有一部分人提出，要终身和鲁迅对话，所以我根本不担心鲁迅的力量。



钱理群近照(摄影 阮梓兵)